

当代日本教育丛书

当代

日本道德教育

丛书主编

朱永新

王智新

本册著者

朱永新
尹艳秋

王智新

山西教育出版社

当代日本教育丛书

当代日本道德 教育

朱永新

王智新

G531.3
尹艳秋 著



A0771149

山西教育出版社

《当代日本教育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张承先	大田尧
	张 健	小山宙丸
	张圻福	泷泽博三
主 编	朱永新	王智新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山住正己	王智新
方展画	右岛洋介
朱永新	铃木慎一
堀尾辉久	袁振国

序 言

当今国际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这一形势下，各国都期待着我国能对世界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起到更大的作用。其中世界各国对我国教育的关心程度，这几年是越来越大了。

对日本的教育，从学校教育开始到社会教育，全面地、广泛地进行研究，并以多达 20 余卷的丛书形式，而且是用外国语言进行介绍，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我认为这非常及时，其意义十分深远重大。贵国与我国是具有千余年交流历史的老朋友，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相互学习，克服困难，不借助外力地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关系。近年来教育、学术、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也在积极地展开，加深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真是巧得很，今年正值 1992 年日中邦交恢复正常化的 20 周年。在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当代日本教育丛书》问世了，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我相信，通过本丛书，各位能进一步了解日本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由此必将进一步加深我国与贵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使我们之间相互信赖的关系更加坚定不移。

日本国文部大臣

楊山部夫

1992 年 7 月

《当代日本教育丛书》前言

日本是一个谜。

这个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土地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的岛上“小国”，却创造了无数令人惊叹的世界奇迹：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名列世界首位，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

在世界最尖端的科学技术领域，日本领先了差不多半壁江山；

国际金融资本的 85% 来自日本；

按股市价，日本包揽了世界最大银行的前 10 名；

日产电子产品行销世界的每个角落；

美国经常性收支赤字的三分之一以上依靠日本资金的补充；

联合国经费预算的 11% 由日本提供；

.....

日本为什么能获得如此的成功？探求日本成功秘密的研究纷纷展开，研究其成功秘密的著作文献不断问世，从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到赖肖尔的《日本人》、傅格尔的《日本名列第一》、马斯卡与艾豪斯的《日本的管理艺术》、威廉·大内的《Z 理论》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它们都从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日本成功的谜底。教育是日本成功的谜底之一，已越来越成为世人的共同看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为了借鉴日本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经验,也为促进中日两国的教育文化交流,中国和日本教育学界的同仁决定联手编写《当代日本教育丛书》,以全面、准确地介绍日本教育的情况,反映日本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经验教训,并适当结合中国实际,总结日本教育的成败得失,为我国“借他山之石,攻己之玉”提供参考建议。

之所以选择日本教育作为我们研究的重点,乃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人口众多,资源贫乏,是两国的特征。更因为日本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不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再发展教育,而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条教育与经济同步发展、以教育推动经济发展的道路。日本只用了不到 50 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用 200 年才走完的道路。事实证明,这是一条值得借鉴的现代化之路。

日本的教育在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不断适应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日本的教育也在不断地进行调节和变革。中国的教育如欲迅速发展,密切反映当前国际、国内的社会要求,推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要有一个新的起点、新的视角,以便少走弯路,尽快与发达国家的教育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有鉴于此,这套丛书在适当回顾日本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主要以当代日本教育为横截面,着力反映当代日本教育的情况和趋势。

这套丛书计划出 20 种左右,每种 20~25 万字,值今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之际推出第一批,到 1996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25 周年出齐。

在中国,出版专门研究一国教育的大型丛书还不多见,我们感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重点解剖一只麻雀,细致缜密、系统深入地研究一个国家的教育,或许会得到更多的启迪、更多的借鉴。这套丛书除一本具有概览或手册性质的著作外,其

余则分门别类地介绍日本的教育改革、教育管理、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国际教育、道德教育、授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企业内教育、特殊教育、教育咨询、电化教育、教育研究、语言学校等方面面。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借鉴日本式的研究方法研究日本教育。

出于对这套丛书的关心和支持，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承先、日本教育学会会长大田尧、《中国教育学刊》主编张健、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小山宙丸、苏州大学副校长张圻福、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所长泷泽博三欣然应允为本丛书担当顾问，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日本教育学会会长大田尧还热情洋溢地为这套丛书写了推荐书：“这套丛书是日中两国教育研究者密切配合、共同研究的成果，就我所知，像这样规模的以日本教育为研究对象的汉语出版物，还没有见到过，它的出版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教育，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国际理解，无疑是很大的贡献。”日本文部大臣鸠山邦夫在百忙之中为丛书题辞，表达了他对丛书的美好祝愿。

为了保证丛书质量，组成了由中日两国的学者共同参加的联合编辑委员会，邀请了对中日教育有专门研究和丰富写作经验的学者为丛书作者，知名日本教育研究专家金世柏教授、钟启泉教授、钟清汉教授、梁忠义教授等也都慨然承担了本丛书的专题写作。

这套丛书还得到了中国教育学会、日本教育学会、日中教育研究交流会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山西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山西教育出版社，在图书市场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决定高质量、高速度地出好这套丛书。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作为一种尝试，丛书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点，为了

不断改进工作，提高丛书质量，敬祈读者专家批评匡正。

当代日本教育丛书编委会

1992年5月

第一章

日本道德教育思想

任何国家或地区的道德教育模式及特点与其道德教育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而道德教育的思想又是基于对“道德”的认识的。因此，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日本社会关于道德的基本概念的诠释及其认识的发展历史。

一 道德、伦理与宗教

（一）道德的定义

和中国一样，在日本，道德泛指人们社会存在的规则和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是用善恶标准来评价，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来进行调节的。无论哪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传统习俗、规范。这些习俗、规范都是共同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全体成员，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通过无数次的反复实践、不断摸索后才形成的，对整个社会的稳定、统一以及延续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这些习俗、规范的种类很多，几乎涉及到每一个属于该社会的成员，其中政治、宗教，包括有些祭祀祖先

的礼仪、节祭以及在进行这些活动时所举行的供祀仪式，吟颂的歌曲、蹦跳的舞蹈等，与构成这一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着十分深远而且紧密的关系。为此，这些社会习俗、规范又成了一种在每个社会成员心理上普遍都起到约束作用的约束力。因此，道德也会给某一部分人带来不愉快感、不方便感，于是就孳生了违反、反抗乃至破坏这些规范、习惯的逆反心理。并且，这种违反、反抗又多发生于个人利益与社会的习俗、规范相矛盾、有冲突之时。当最初的违反、反抗社会规范、习惯的行为发生时，人们才第一次开始考虑自己所遵从的习惯、规范的意义。我们现在所遵守的习俗、规范它有什么道理？为什么尽管自己个人的利益、欲望受到约束，但也还是要去遵守它、维护它？为了解答这些疑问，就必须弄清社会规范、习俗所具有的合理性。这样就产生了道德意识。道德就是从习俗中人们感到要遵从习俗、意识到必须做什么，这一社会规范中萌生并发展的。然而，同样是规范，道德又不同于那些伴有社会性制裁的规定或法律。规定、法律是外部的带有强制性的力量；而道德则是内部的自己主动地去接受并遵从的力量。遵从这些习俗、规范就是好的、善良的；反之则感到罪恶，这一惩罚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自己内部，受到良心上的谴责。这样就激发了一连串的问题，如为什么没有人命令自己也会感到必须要去做？为什么如果违反了规范会使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作为道德判断基准的善恶又是什么等等。

上面提到的这是应该做的，那是不应该做的，这种在自我心中产生的道德判断标准，涉及到长期以来道德理论（伦理）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道德起源和道德价值问题。在中国，早有所谓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谓之教”之说，稍后又有董仲舒“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主张，将道德的起源和作用完全归结为天。在西方则将此完全归结于神和上帝。早在公元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宣称自己是被神谕或命运之

神所引导的。命运之神是居住在人心中的守护神，在人将要干出脱离人道行为之时，它会命令人们停止不要去干的。另外，在《圣经》的“新约全书·多哥林前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这里所说的良心指的就是倾听上帝声音的理性能力，基督教徒认为良心为上帝的声音，同时也是倾听这一声音的理性能力。另外，英语中“良心”一词“Conscience”的辞源为拉丁语的“Conscientia”，为表示一起的副词“Con”和知识“Scientia”的合成词。因此，按拉丁文的原意为人们一起感受、倾听，用以专指理性即上帝的声音，后在英语中演化成“良心”了。一般认为能判断是非善恶的理性是最优秀的。康德还创造了“绝对命令”一词来主张有发出绝对的无条件的道德命令的上帝的存在。他认为人之所以能判断是非、辨别善恶，是因为人天生就有的“纯粹理性”在起作用。

上述的无论是超越一切的神的声音也好，纯粹理性的作用也好，都是承认并极力主张良心的。良心命令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一般被称作为善恶。那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其基准、分水岭又何在？这也是几百年来道德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课题之一。

关于“善恶”的理论有很多，在我国早就有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以及后来广为流传的《三字经》也开宗明义地宣扬“人之初，性本善”。在西方各学说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三种。一是直觉论，持此观点者认为判断某一行为的好与坏，这是人们凭直觉进行的，善恶的基准也在于人们的直觉之中，因此，就没有什么必要再去追究其到底是什么了。第二种观

点是主外派理论，他们认为善恶判断的基准在主体即判断者之外，认为这一基准在于上帝绝对权威的基督教道德，如摩西的“十戒”等圣经中所有对人的规劝和告诫，都表明人的善恶基准在于是否符合上帝的意志；也有像霍布士（Thomas Hobbes 1588—1679年，英国哲学家）那样主张道德起源于契约与自然法（《利维坦》）的，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就在于是否服从君主、是否服从于法律，仅此而已。第三种观点是主内派伦理，认为凡是有助获得个人理性所需求的精神上的幸福的，就是善，而一切妨碍或阻止这一活动的行为和言论都是罪恶。另外，还有从尊重最多数人的快乐出发，以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最高善良的功利主义式的公共快乐论等。

直觉论和主外派论的观点都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主内派所说的“幸福”、“快乐”具体的又指什么，于是又产生出了价值观点，即像贫与富、喜与怒、健康与病患、智慧与愚蠢、真与伪、美与丑、香与臭等对立的概念，代表了正负两种价值。人们如得到了正的价值，也就是获得健康、智慧、真、善、美等，就是幸福或是快乐，而反之就不幸福或痛苦。因此，正的价值就代表善，而负的价值就是恶。但是，价值有高低之分，还有深浅、宽窄等阶段、等级的不同。为此，幸福、快乐的大小、多少就按其所需求的等级、量、质的比例来衡量，质越高，量越大，其所含的正价值的比例就大，因此幸福、快乐的程度就高，善也越大。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年，英国伦理学家），他认为苦乐感情是人性或道德的基础，苦乐的精确计算和道德上善恶的评价密切相关，食欲等关系到人体的快乐只是个人享受的，由于物质的有限性，能够参加到这一快乐中的人也有限，而正义、秩序、真善美等的快乐则是无限的，参加得越多越幸福，他的目标是“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二）道德与伦理

现代社会中与道德相近的词有很多，其中最为典型的即为伦理，人们甚至已经将道德和伦理等同使用，如“伦理道德”或是“道德伦理”。伦理和道德两词在中国古代《礼记》、《易经》中早就有了。但在我国古代时，道德的含义比较广些，并分别寓“道”与“德”以不同的含义，“道”表示事物运动和变化的规则，“德”则表示对道的认识、实践而后有所得。因此，当人们在认识了事物的规律后，内得于己为“道”，外施于人便为“德”。道德两字联在一起使用，最早见于荀况的《劝学》中：“故学至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他不但将道德二字加以连用，而且还赋予其较为准确的定义，即指人的道德品质、思想境界和道德原则、范围等。道德在英文中为“Moral”，其辞源为拉丁文的“Mores”，是表示“习惯、风俗、惯例”一词“Mos”的复数式，原意为“性格、品德”。而希腊语中表示“习惯、风俗”一词的“Ethikos”则是从表示动物经常进出的场所洞穴“Ethos”一词中派生出来的，意思为常住的、住惯了的地方、场所，转意为故乡、老家，又延伸为住在那儿的人们所拥有的习惯、风俗之意。由此可见无论是“Moral”还是“Ethics”原本都是表示“习惯”的，这当然包括应该做的习惯和不可以做的习惯。但是近代日本在引进西方思想时，将“Moral”译成道德，将“Ethics”译成了伦理。最初“Moral”被译为教授规矩、礼仪操行学，甚至被译成礼仪，以后又渐渐地被译成教训、人伦之教、德义、修身学等，到1892年时被译成道德教，直到进入本世纪20年代后，才被译成道德学。从这一历史变化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文中道德一词至少包含着三层意思，一，礼仪规矩、操行；二，善恶之教；三，伦理、道德学。而汉字的伦理的伦，原表示同类、伙伴；理就是条理、顺序，伦理为人与人相处

的顺序、辈分等各种道德准则，与道德的意思基本相同。早在公元前 600 多年问世的《论语》，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伦理学专著，其中集中地论述了当时社会中人与人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他的弟子孟轲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伦理思想，提出了“人伦”这一概念，解释说为：“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夫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我国最早的伦理学说了。但是，从英语、拉丁语中表示习惯的语根来看，汉字的道德、伦理与西方的“Moral”、“Ethics”则不完全等同。西方的道德、伦理是人们在共同体的生活中，为维持集体生活的秩序，经过反复实践后，自然产生的。而东方的道德、伦理，则是在社会秩序崩溃，“天下无道”、“礼坏乐崩”之后，作为恢复秩序，实现统一所必需的手段而被整理出来的，是作为共同体社会的自然习惯、原始规范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带有实用的、功利主义的一面。

东方的道德、伦理原本是同一意思的，伦理为人伦之理、实际的道德规范之原理。如上所述，西方的“Moral”、“Ethics”也是意思相同的，但是自从康德（I·Kant 1742—1804 年，德国古典唯心论哲学创始人）在《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一文中将这两个词加以区别使用，分“Moralitat”为主观意图范围；“Sittlichkeit”（习惯、风俗）为客观道德领域，并认为国家的伦理是建立在个人道德之上的。从此以后，原本相同意思的“Moral”、“Ethics”就分道扬镳了。近代初期，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1855—1944 年）在翻译引进西方道德伦理著作时，也受康德的影响，把“Moral”译为‘个人道德’；把“Ethics”译为‘社会伦理’并创作了“伦理学”一词，作为专门研究道德的起源、本质及范畴的学问。这样伦理学和认识论、美学一起，成了哲学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三）道德与宗教

在西方，道德上所说的“善”和宗教上的“善”经常混淆在一起。在日本道德起源又往往与开国神话、国家宗教混淆在一起，使得人们分不清现实中的道德标准和宗教中的信仰之界限，造成了很多悲剧。加之日本人在从中国引进儒家学说时，将之演绎为儒教，俨然以宗教形式来加以宣传、推广和传播，这就使得本来就混杂在一起的道德和宗教的关系在日本更为复杂。回顾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科学不发达，共同体的习惯都是宗教习惯，因为共同体的规范都是在举行宗教仪式中形成的。直到中世纪为止，欧洲的社会规范基本上都是基督教规定的。所以，从历史上来看，道德和宗教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自从欧洲的文艺复兴提出了人道主义，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摆脱教会对于人们思想的束缚，打倒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后，笼罩在道德伦理学上的神学面纱开始脱落。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宗教是个人的信仰问题，而一个共同体则是由众多宗教信仰不同的人组成的，为此，不必强求共同体的规范必须和宗教规范一致。既然道德是建立在共同体习惯之上的，那么各个不同的共同体就有自己不同的价值基准和道德规范。而且，就同一共同体而言，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共同体内部本身质的变化，该共同体的价值基准也会跟着发生变化，为此，道德基准和道德规范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事实上，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与今天的道德观念就完全不一样。就是相同的时代，中国和日本的道德观念不同，中国、日本和美国也不尽相同。然而，信仰超越一切的万能的上帝的宗教的道德基准、道德规范却是一成不变。为此，宗教上的善，与道德上的善并不可能完全一致。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在他的哲学著作《恐惧与颤栗》中曾对《圣经》中著名的故事——上帝为考

验亚伯拉罕，命其将自己年迈时所得之心爱的儿子以撒领到摩利亚山，杀之作祭献。亚伯拉罕遵命，举刀欲砍时，为天使所阻，命其杀羊以代——以存在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亚伯拉罕是遵从上帝的命令还是怜悯儿子的苦恼进行了十分有名的考察。这个故事说明了，上帝与人之间所存在的宗教道义上的善，和人与人之间的规范——伦理道德上的善，是有冲突的。对一个信奉至高无上的造物主的教徒来讲，上帝的命令是高于一切、超越人间所有规范、绝对不可违反的，这样就会和道德发生冲突。为此有人将宗教中的善恶用“Good、Evil”，而将道德上的善恶用“Right、Wrong”，区别开来表示。在宗教中上帝就是善的化身，是一切善良的象征。道德上的善，在宗教上有时可能是恶；而宗教中的善，有时可能是道德上的恶。这就涉及到宗教、信仰的根本性、实质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日本长久以来一直争论很激烈。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创始人亲鸾（1173 - 1262 年）在其著作《叹异抄》中曾提到这个问题。他一反前人的唯有好人才能修成正果，得救成佛的观点，认为“既然善人能得救，恶人就更没有得不到拯救的道理”，提出“恶人正机”论，强调恶人才正是阿弥陀佛拯救的对象，不必成天修勤称名念佛、朝山进香，只要坚定信念就可成佛，主张僧侣也可食肉、娶妻，过与凡人相同的生活。日本近代剧作家仓田百三（1891 - 1943 年）将亲鸾的事迹，写成了剧本《出家人和他的弟子》，尖锐地提出了宗教与道德的矛盾，在全国公演后引起很大反响。欧洲也有很多反映这一题材的文学作品。近年来，有不少人在有生命危险，接受医疗抢救时，仍以宗教信仰为理由，拒绝接受输血治疗，这也是宗教和道德冲突在当今的反映之一。

日本《教育基本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和地方政府开办的学校，不许为特定的宗教进行宗教教育及其他宗教活动”。这是在汲取了二战前，军国主义分子利用道德课程，疯狂进行国家主义

宗教教育，将广大日本人民拖进了战争深渊的教训后做出的决断。但是，在今天日本的道德课和道德教材中，我们还很难说就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不少地方还存在着死灰复燃的现象。我们将在后面几章中详细地来阐述这一问题。

二 日本原始的道德教育思想

从历史上来看，儒教、佛教和日本的神道教，这三大宗教对日本人的伦理道德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再加上日本的风土、气候和地理环境等的影响和作用，自古以来日本人就以清明之心、正直、诚实为重，这就形成了日本原始的道德伦理标准。直到江户时期（1603—1867年），日本才开始形成将上述三种宗教揉合在一起的日本独特的道德思想。在此以前，日本人的道德伦理一般说来是比较重视心情、情绪，流于感情的比较多，也有人说这是因为日本的伦理道德还不成熟，缺乏客观规律，尽管日本人至今也一直在努力尽可能客观地来把握这一规律。除了这些以外，日本还有不少从中国传入的、在中国儒学等思想影响下形成的道德标准，如忠孝、勤俭等等。这些从中国传入的道德，经过日本道德思想家独自的诠释，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被日本人崇为美德，并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扎下了根。纵观日本伦理道德史，可以发现中国的伦理道德思想在日本民族道德伦理思想的形成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甚至可以说在某一阶段是决定性的。本节主要探讨日本原始道德思想，故对有些明显是受中国道德伦理影响形成的道德伦理观，如孝、忠、义、勇（当然，这些概念传到日本后基本上都起了变化）等，就不多赘述。试图通过对日本民间原始的、本土的道德伦理思想的梳理和介绍，使读者能了解今日日本道德伦理形成的来龙去脉。